

试论蒋梦麟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及其现代启示

邬红波¹, 孙善根²

(1. 宁波大学 校长办公室, 浙江 宁波 315211; 2.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临危受命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大力实施以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为核心的改革举措, 积极改革与整顿北大, 使一度衰败的北大重获生机与活力, 其教育思想与实践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 蒋梦麟; 北京大学; 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 (2011) 03 - 0001 - 05

蒋梦麟(1886-1964)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他先后主持北京大学近 20 年, 是北大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在 30 年代极其困难条件下, 他大胆改革, 勇于担当, 积极实施以“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为核心的改革举措, 使北京大学发展成为全国教育与学术中心, 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写下辉煌一页, 至今仍不乏其借鉴意义。本文试就此进行阐述, 不当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

一、校长治校

1926 年“三一八”惨案后, 长期代理北大校务的蒋梦麟为避免北洋军阀的迫害而离开北京大学。迭经北洋军阀的摧残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折腾, 北大发展举步维艰。1930 年 12 月 4 日, 经蔡元培推荐, 时任南京政府部长的蒋梦麟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不久, 他即乘车北上, 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对于蒋梦麟的到来, 北大师生寄予厚望。他们认为过去的两年北大“最根本的缺陷, 要算是没有一个能用全付精力以从事于发展本校的正式校长了, 现在我们有蒋先生来填补这个缺陷, 这当然是令我们全体欢欣鼓舞的一件事”。^[1]胡适、傅斯年等旧友更是翘首以待。面对北大师生和诸多朋友的重托, 蒋梦麟重振北大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继承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结合自己的教育理念, 对学校

的行政和教学科研制度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1931 年 1 月 26 日, 在北大纪念周上, 蒋梦麟正式提出“教授治学, 学生求学, 职员治事, 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 并说明了实施方针的具体内容, “教授须延聘大师、学者充之。校长当改善学校环境, 使教授、同学打成一片, 潜心努力学术。”^[2]并亲自主持起草《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 于 1932 年 6 月 18 日公布。该大纲按照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 参照北大历史传统和惯例而制订。明确规定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

大纲取消评议会, 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出的代表、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组成, 以校长为主席。事实上是一个教授会, 其组成和职权与评议会基本相同。其职权有包括决定大学预算、学院学系设立及废止、大学内部各项规程、校务改进事宜、校长交议事宜等。与 20 世纪 20 年代相比, 此次改革将学术与事务明显地划分开来, 校长的权限明显强化, 行政人员的编制和职责也明显地扩张, 似乎有点“校长独裁”的味道。舆论界对此亦有所非议。有人说: “北大今日在蒋氏治理之下, 确较年前稍有声色, 但‘教授治校’变为‘校长独裁’, 今后校长恐随政治而转变, 是为可虑耳。”但实

收稿日期: 2010 - 09 - 06

第一作者简介: 邬红波(1978-), 男, 浙江余姚人,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高教管理。E-mail: wuhongbo@nbu.edu.cn

际上,除了行政事务多由校长决定外,教务方面完全由各院系负责,校长从来不予干涉,因为蒋梦麟认为这是专家范围以内的事。校长对学术范围内的事务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尊重。特别是1931年9月校务会议正式组成以后,行政大权集中于校长的情况也明显改变,学校大权归于校务会议。学校除设立校务会议外,还设立行政会议,由校长、各院院长、秘书长、课业长组成,校长为主席。另外还设立教务会议,计划学校的教务事宜。同时仍然设立考试、图书、仪器、财务、出版、学生事业各委员会。各委员会主席及委员由校长就教授中指定,提交校务会议决定。

从蔡元培的教授治校到蒋梦麟的校长治校,一方面可以看到了期间的差异与变化,这主要是与20世纪30年代政治环境的恶化有关。蒋梦麟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强权政府和自由理想之间寻求妥协,当然也与其教育思想有关。另一方面,更能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延续和前后相因关系。事实上,30年代的北大,教授治校的基本格局仍得以维持,这体现在蒋梦麟对蔡元培民主治校思想的坚持。与乃师推崇德国大学模式不同的是,蒋梦麟力图以美国大学教育思想改造北大,特别强调学校事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如原属各学院的事务、教务、杂事,现统归秘书处和课业处负责,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事务的现象,使教授能专心治学。正是由于蔡元培治校时开创的自由风气遗风犹存,使得30年代的北大还保留了早在五四时期就已开设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课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等等。当时北大还有“五公开”或“六公开”说法,即课堂公开,教室可以随便进去听课,讲义只要付钱就可以买到,图书馆、阅览室公开;浴室公开;运动场公开;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校外商人开的;学生宿舍管理也相当松散,实际上是半公开的。这些无疑成为专制统治趋于强化的30年代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二、教授治学

广纳贤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北大曾以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享誉国内高校,然时值蒋梦麟接任时,北大人才流失极为严重,教师兼课之风甚盛,教学秩序相当混乱。

整顿校风,提高学术水平。蒋梦麟上任便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首先多方物色院长人选,文学院院长开始由蒋自兼,不久即请胡适出任院长,聘周炳琳、刘树杞分任法学院和理学院院长。然后他对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为取得南京政府对北大改革的支持并物色各地优秀人才,1930年初,赴南京、上海等地,分别拜见蔡元培、蒋介石和中央大学校长等人,并获得他们的大力支持。

而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各项措施中,又以设立“研究教授”和“专任教授”最为著名。“研究教授”制度是1931年北大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建立“合作特款”后设立的。研究教授的人选以“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并规定“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385]研究教授每年度聘任一次,每位被聘的研究教授须于每年年终时,提出研究工作报告。蒋梦麟设置研究教授的后盾,即是“合作特款”。此项每年30—40万元的“合款”,仅用于支付研究教授的薪俸即占1/3以上。研究教授待遇较高,每月薪俸即有400—600元,加上每年1500元设备费,使国内其他大学望尘莫及。如1931年国立大学教师的月薪平均为265.2元,省立大学为217.5元,私立大学仅为124.3元。^[4]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加盟北大。据统计,1931年首批发表被聘请为研究教授的便有15人。从1931年至1936年,北大每年都聘请16—22位著名学者到北大担任研究教授。

为保证教授专心教学,1931年北大还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待遇,规定在他校兼课者薪金较专任者少,兼课时数较多者,则改为讲师。同时改变过去教授第二年续聘后即无任期限制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1年,续聘订约2年,在聘约期内不得中途他去,且规定每个教授每周授课时间为12学时。这一制度改变了20年代后期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多在校外兼课而影响本校教学质量的情况。为提高教学水平,北大还约请校外学者为名誉教授,如1934年度的名誉教授有李麟玉、翁文灏、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陈垣、林可胜、马衡、陶孟和、

孟森等，都是各自领域顶级学者。

关于聘请教师的原则，蒋梦麟表示“对聘请教授亦取人才主义，不论私交，亦不顾与学校历史久暂，绝以其个人能否及肯否负责教授为转移。……对北大教授，向责成各院长负责聘请，余不过问。”为了广揽人才，蒋梦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破格录用新人。如胡适发现吴晗史学研究有根底，蒋梦麟便予以重用，后胡适又发现钱穆国学很有水平却不被燕京大学续聘时，蒋梦麟便请他来北大当教授。又如千家驹是以研究《资本论》著称，曾是学生活动积极分子，见解独特，仍聘他为北大经济系兼任讲师，放手让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中国经济问题。

改善教师的学术研究条件。1934年7月，北大制订资助助教留学规则，规定助教服务满5年，各方面表现良好，可资助出国留学。同年底又恢复教授休假研究规程，规定连续服务5年者，可请求休假1年从事研究，休假期赴国内外各地研究者，学校资助其旅费并支给全薪。休假1年后又连续服务满6年可再请休假。

恢复和建立学术团体，推进学术讲演和中外学术交流。30年代，除国内学者外，还先后邀请著名的外国学者来北大进行学术活动，如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威尔逊，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史密斯，巴黎大学文学博士马克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肖威尔，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三浦周行，巴黎大学教授郎之万等都曾到北大进行学术活动。为活跃学术空气，交流学术思想，此时北大还陆续恢复出版各种刊物。除学校主办的《北京大学日刊》，还有《国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季刊。北大师生还通过学会共同编辑出版有关书刊，如著名的地质学会编辑出版的地质丛书，在当时的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恢复了月讲制度，由著名学者定期举行学术讲演。

三、学生求学

倡导读书救国，大学生当以求学为职志。为了确保学生专心求学，他上任不久便主持制订《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并于1932年12月公布。取消选科单位制，实行学分制。规定本科生修业年限为四学年，每学年上课至少28周，至少修满132学分方可毕业。此外还规定四年级学生毕业前须交毕业论文，经审查合格后方可毕业，授

予学士学位。学生上课采用考课率，缺席按数扣分，缺席1/3以上者，取消考试资格。对缺席过多者，采取留级或退学处置。对于课程的设置，采取“精纯主义”政策。他曾说：“北大以前课程失之广泛，不但应有尽有，而且不应有亦尽有。其不需要之课程，徒耗国家财力，并废学生有用光阴，于其所研究之专科，并无裨益，故近来对此种课程，毅然裁去。”

对于学生管理的规定均较以往严厉与规范。但实际上，30年代北大在学生管理方面延续了自由宽容、注重个性发展的传统。当时的北大学生仍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就以选修课来说，学生就相当自由。北大学生的选课，校方既无严格之规定，教授对选课修课也极放纵。当年就读北大的柳存仁所言：“北京大学的选课，真是贯彻了真正的民主精神的行为。虽然每一系的课程至少也有十余种，常常多至数十种，虽然也在说明书上规定了年级和选修、必修等各项不同的划分，但是，每一个北大的学生都知道北大从来也没有什么课程可以严格的认为是必须要的。”^[5]即使是教授们，也大多鼓励学生各就所好，专心发展，对于学生的选课及修课并不强求，所以师生间形成了“只有陶冶而无训练”的共识。

继承通才教育思想，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在基本课程方面，蒋梦麟根据教育部《大学规程》的要求，规定大学一年级新生不分系，各院系必须订定共同必修科与基本课程。例如理学院之共同必修课是第一外国语、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文学院则是基本英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要求理科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知识，文科学生必须学习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加强对学生基础知识和理论教育的同时，对专门化课程的要求也在加强，教学方面偏重专精方面发展。这显然与蒋梦麟提倡的“提高学生程度，学科务求其精，不务其多”的主张有关。如当时北大各系大致确定了一、二年级之课目注重基本知识，三、四年级之课目注重高深研究的基本原则。从这一时期北大课程设置上看，各系都开设了一些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相联系的专门化课程。有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与专业人才的培养。一些系在教学中还紧密结合社会实践，鼓励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如开展参

观、考察以及旅行等活动。活动多由学生自由参加和自由结合,地点多在国内,有的也到日本等国;经费自筹为主,学校也给部份津贴。^{[6]66}

注重对学生的外语教学和西方文化的灌输。北京大学则规定本校学生必须掌握一门外国文字。凡入国文系者必须外文成绩好,入外国文学系者,必须国文有底子。对于西方文化,蒋梦麟曾公开表示:“我是一直主张向西方学习的。”^{[7]213}并努力倡导输入西洋文化,鼓励学生多读外文书籍。他说“能多读外国的书籍,那么宝藏兴焉”。^{[3]5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这一时期的北大课程绝大多数采用美国的教科书,教学内容也多模仿美国。教师讲课,写文章,也常用英文,甚至中文、历史许多教员也不例外。由此,北大学生不仅外文程度高,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相当深入。

恢复并改组研究院。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时制订的《大学组织法》要求“大学得设研究院”。北大虽在蔡元培主政时在高校中率先设立研究所,却始终没有步入正轨。1931年,蒋梦麟恢复原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招生工作。1932年又改研究所为研究院,招收大学生入院研习,蒋梦麟以校长兼研究院院长,下设文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3个部。当年10月,研究院第一次录取新生25名。1934年6月,蒋梦麟再次改组研究院,将3部改为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并对入学考试、论文答辩、学位授予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设立研究院院务会议,专门负责研究院各项工作,使北大研究院工作走上正常化、正规化的轨道。

重视学生体育工作。早在20世纪20年代代理北大校务时,他发现学生大多瘦弱多病。为此在演讲和文章中,多次呼吁要注重体育,学校要培养活泼、主动、有能力去改良社会的人,而不应再培养书呆子。长期以来,体育一直是长于学术的北大学生的弱项。为提高学生体质,改进学校体育工作,北大于1934年下半年规定体育课为必修科,并改第三院大礼堂为临时健身房。为提倡体育,又于1936年10月,举办全体师生体育大检阅,1937年春举办第一届体育普及运动会,使学校体育面貌为之改观。

蒋梦麟一贯注重学生学习环境的问题,特别是为改善北大学生的住宿条件,作了长期的努

力。^{[7]204}1934年,在他的努力下,北大终于在松公府东院北面兴建了一幢学生宿舍,每室8平方米,附壁室2平方米,每室住1人,住房条件相当优越,使北大学生住宿条件有了“划时代”的改善。这一时期北大校内的学术空气浓厚,学生发奋求学,同时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丰富多彩。30年代,北大学生成立了各种学术团体,如化学会、经济学会等10多个团体。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北大学生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成立各种救亡社团,如黎明歌咏团、世界语协会、国防化学研究会、国际问题研究会等,同时创办各种刊物,著名的有《北大周刊》《北大旬刊》《我们的队伍》《解放之路》等,还经常举办座谈会、讨论会,其中时事讨论会当时在北大校内外都很有影响。

对于20世纪30年代执掌北大的情形,后来蒋梦麟在《西潮》中有一段总结。他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过渡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而调整帆篷而已。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6]200}这番总结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在蒋梦麟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北京大学迅速从20年代末期混乱衰败中恢复过来,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步上正轨上并在许多方面较之20年代有所发展,享有全国最高学术中心之誉。诚如胡适所言:他(指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这个时期,北大的学风和精神继续得到积淀和发扬,沙滩、马神庙、北河沿一带,仍然是全国学子心中向往的地方。^[8]台湾学者吴相湘在评价蒋梦麟时说:“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地位仅次于蔡元培。……蒋主持北大近二十年,不顾内乱外寇之困扰,勇敢负责,勤奋建设。危城讲学,大义凛然。终蔚成全国最高学术中心,作育人才至为众多。”^{[3]51}特别这成绩是在华北危机日趋严重,时局动荡不宁的时代背景取得的,蒋梦麟的努力尤其值得后人敬

佩。认真回顾与总结这一段历史，对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校大规模的扩张，使原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更加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就是办学质量滑坡，学校行政化倾向严重，效率低下，与世界先进高校的差距加大。尽管时代条件不同，但回顾20世纪30年代蒋梦麟在北大的改革仍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其一，高校领导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蒋梦麟改革北大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是一个对教育有着独特见解和丰富学识的教育专家，由此他懂得教育与管理，了解师生的需求与期盼，知道决定学校发展的关键所在。也许我们不能要求现在大学的所有领导者都是教育专家，但必须要求他们懂得教育，努力掌握教育发展的学识与规律。其二，大学乃有大师而非大楼之谓也。教师是办好一所学校的依靠和根本力量，深知其中道理的蒋梦麟在改革中始终调动广大教师特别是教授们的积极性作为根本举措而贯彻始终。为此努力提高教师的待遇，使之无后顾之忧，并努力发挥他们在教学科研乃至管理上的作用，因此吸引各方英才云集北大。反观今日之不少高校，热衷于大兴土木，大造楼堂馆舍，但对广大教师的切身利益表现得

较为冷漠，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比较清苦，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其三，充分发挥广大师生在高校决策与管理工作中。如今许多高校管理人员庞大，效率不高。在不少高校，师生没有机会参与决策。管理部门是决策者、执行者，而广大师生成了被执行者。这不仅影响决策的科学性，而且危及学校内部的团结。改变这一现状的重要途径，就是努力发展各类自治团体，让广大师生通过团体与个人的形式参与学校决策与管理工作中。

参考文献

- [1] 之季. 由欢迎蒋校长说到我们第一步的希望[J]. 北京大学日刊, 1931(1).
- [2] 关国焯. 蒋梦麟先生年表: 5[J]. 传记文学, 1982, 40(6): 45.
- [3] 吴相湘. 蒋梦麟振兴北大复兴农村[M]// 吴相湘. 民国百人传: 第1册.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 [4]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 南开大学校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121.
- [5] 柳存仁. 北大与北大人[J]. 宇宙风, 1941: 39(8).
- [6] 蒋梦麟. 西潮·新潮[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66.
- [7] 曲士培. 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 [8] 刘克选, 方明东. 北大与清华[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296.

On Jiang Menglin's Reforming Peking Univers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WU Hong-bo¹, SUN Shan-gen²

(1. Presidents' Offic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315211, China; 2.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930s, Jiang Menglin,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made significant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policy of “president ruling university, professors pursuing the studies, students learning, staff doing things”, in order to positively reform and rectify Peking University. It rejuvenated Peking University and its educational ideology and practic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day.

Keywords: Jiang Menglin;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form

(责任编辑 张文鸯)